

從建築系學生到左翼實踐者的青年成長史

吳永毅訪談*

時間

2018年3月31日

地點

新竹 國立清華大學圖書館

左翼啟蒙

林麗雲(以下簡稱「林」)|關於你個人的成長背景、左翼啟蒙過程,在你的《左工二流誌》(以下簡稱《左工》)中已經做了交代,¹你是在淡江大學期間就確認了左翼信仰,雖然當時還只是接觸、摸索階段,我們今天就不從你個人成長史開始了,會集中在你和「台灣民主運動支援會」(以下簡稱「OSDMT」)的關係,以及建築專業和左翼運動之間的關聯來談。從你的傳記來看,你在淡

* 本文是由亞太／文化研究室執行的科技部研究計畫：【台灣左翼思想口述計畫(1970年代至1980年代)】(NSC 103-2410-H-009-033-MY3)與由釣魚台教育協會、國立清華大學圖書館特藏組、國立交通大學亞太／文化研究室三方合作的【OSDMT口述史計畫】部分成果。訪談參與者：林麗雲、陳瑞樺、李雅雯；訪談稿由陳冉涌、李雅雯整理。

吳永毅補充說明：原本逐字稿的來源是林麗雲和陳瑞樺邀請我到清大圖書館，辨識「台灣民主運動支援會」(以下簡稱「OSDMT」)檔案中與我、王蘋和柏克萊相關的文件，並且在辨識工作之後進行的訪談，希望能建立或補充檔案的詮釋資料。因此訪談問題著重於之前被辨識出的一些檔案的脈絡，以及我和OSDMT的關係。後來《人間思想》預定將這篇訪談稿收入「建築專業與左翼實踐」的專輯，所以在2020年12月，我再試圖從這個脈絡，重新修訂和增補了這篇逐字稿。

1 吳永毅(2014)《左工二流誌：組織生活的出櫃書寫》，台北：台灣社會研究雜誌社。

江接觸了很多人，其中哪些人影響了你開始有左翼信仰？哪些人又讓你後來到美國再接觸OSDMT這樣的團體？

吳永毅（以下簡稱「吳」）| 淡江時期對我的影響，在《左工》²已經說過；我和林孝信及OSDMT的關係，大部分已經在〈家庭相簿裡的另一個老林〉³（下文簡稱〈相簿〉）一文中說過；我就不進入細節，儘量以補充脈絡的方式讓讀者可以簡略地了解那個時代的氛圍。1976年剛進淡江時期主要就是受到大一國文老師李元貞、大一英文老師王津平的影響；師生關係之外還有李雙澤為核心的「動物園」生活圈，王津平和李雙澤互動很密切，常常到動物園唱歌，進出的人包括建築系的學長徐立中和孫嘉陽、我讀歷史系的姊姊的同學李利國，還有我師大附中的死黨林洲民和李瑋珉，因為我重考一年，而比他們低一屆進入建築系，一到淡江就被拉入這個圈子。李元貞語不驚人死不休的女權解放觀點和身體語言，當然不斷衝擊著男性情誼掛帥的附中青年文青世界；王津平和李雙澤的激進反美帝立場和奇特台灣味的愛國／中國民族主義，是我的政治啟蒙，讓我從存在主義文青的去政治化的狀態，逐漸接受左翼的激進態度。正如我在《左工》所說，我喜歡把自己放在激進、自以為獨特的邊緣位置，當時的淡江左翼就有這種新鮮感。

與這個圈子平行但又間接關聯的是見識了台北的文化圈：林洲民和我替畫家鄭在東拍一部實驗電影，演員是詩人管管；我們倆也幫《影響》雜誌做美編，因此認識了電影圈的人，包括黃建業、李幼新、還沒有成為職業攝影師的杜可風；應該是1976或1977年的暑假，我們在西門町的試片室看了近百部的電影；李元貞找來協助劇場發想，剛從日本回來的王墨林；羅斯福路稻草人餐廳的Stone，和常去那裡的搖滾樂迷。另外一個圈圈就是我在師大附中的大哥——詩人羅智成，他考上台大哲學系，並當選文學院學生代表會會

2 吳永毅(2019)《左工二流誌：組織生活的出櫃書寫》(增訂第三版)，台北：台灣社會研究雜誌社，頁50-53。

3 吳永毅(2019)〈家庭相簿裡的另一個老林〉，收入王智明、吳永毅等(2019)《從科學月刊、保釣到左翼運動：林孝信的實踐之路》，台北：聯經，頁80-89。

airiti

長；重考和太一期間，也會被叫去這個台大文學院社群廝混，認識了他的學妹羅曼菲、陶馥蘭和我暗戀的Z，還有台大現代詩社的廖咸浩、詹宏志、楊澤、苦苓。我真的也蠻融入這個圈子的，所以四十多年後，羅智成替我的文藝短篇文集《鬼在春天做什麼》寫序時，⁴流露出惋惜，認為我走錯了道路。

林 | 開始有一個類組織或左翼社群的關係，是在哪時候發生的？

吳 | 實質上的組織關係應該是在去了美國之後才發生的，但是在台灣淡江所累積的社會網絡，事後回想是一個重要的因素。1976到1977年的大一階段密集地被這群建築系為主的學長們和背後的王津平和陳妙芬夫婦所影響，但是到了大二，因為李雙澤去世，我和印尼僑生K開始同居，沉溺在私生活裡面，就比較退卻了，與公眾事務又漸行漸遠，比較沒有參加黨外或其他活動。那時候林洲民、李瑋珉他們雖然不會走到黨外運動第一線，但會去替黨外雜誌拍照和寫稿，基本上我比較沒有。事後推測，王津平應該沒有放棄我，把我放到一個可以繼續拉攏和觀察的外圍位置；他組織了*The Social History of Art*⁵的讀書會，我們讀的是Arnold Hauser⁶的英文原文書，來過讀書會的有蔣勳和施淑女；夏鑄九沒有來過，但是從這個圈子向外延伸和他的網絡接上了線。我記得王津平還組織過一次郊遊，夏鑄九、蔣勳和馬以工都來了，也就是我後來在《左工》定義為第一代海歸左派的網絡。為何說王津平把我放在外圍位置？因為在2019年11月10日的王津平追思會上，聽到跟我同一世代進入王津平核心的學生說，王津平會送一本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給他們，我顯然沒有跨過這個送禁書的組織考察界線。當時我有一些

4 羅智成(2014)〈Dear W的記憶迷宮〉，收入吳永毅(2014)《鬼在春天做什麼》，新北：蟹樓，頁7-23。

5 編註：繁體中文版譯為《西洋社會藝術進化史》(邱彰譯)，1987年由台北雄獅圖書公司出版。

6 編註：亞諾·豪斯(Arnold Hauser, 1892-1978)，匈牙利藝術史家，藝術社會學家的創始人之一，著有*The Social History of Art*。



2018年3月31日，於國立清華大學圖書館。

左翼的初步啟蒙，關心這些事情，但是沒有實際的行動。

2020年中風後的蔡建仁談到王津平的追思會時，用含糊聽不清的語言，當面跟我強調，他認為王津平這種一個也不放棄的樂觀派組織方式，才是對台灣左翼真正有貢獻的人物。蔡建仁的評價在我的身上至少是正確的，當年我如此自溺於私領域，王津平仍然努力調動人際網絡來維持跟我的關係，只是我自己沒有想要再進一步，因此沒有在那個階段走到黨外政治或運動裡面去。

同居的K對我的性格發展也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和衝擊，這在《左工》沒有說清楚；《鬼在春天做什麼》的〈80c.c.·怕水〉⁷裡面描述了她對我身體的教練和啟迪，我是因為遇到她而轉大人或轉男人的；同時，她對我的價值觀其實也有很大的影響。她的父親是印尼獨裁者蘇哈托的心臟科醫生，父母把她送到澳洲住宿女校受嚴格教育，沒想到她卻和年紀大她很多的吸食大麻的衝

7 吳永毅(2014)《鬼在春天做什麼》，新北：蟹樓，頁208-237。

浪人(surfer)發生關係，才被父母趕緊送來台灣隔離。所以她有極大的叛逆性，又有澳洲的西方優越感，又繼承了反文化和性解放的道德觀；我作為第三世界的處男、媽媽寵愛的唯一男生，被李元貞啟蒙之後，再被K天翻地覆地翻轉。她是受英文教育成長的，又要依賴我的中文能力協助她完成學業，我們就這樣中英文互助共度了五年。她愛玩、愛去海邊夜泳，卻也是手不離(英文)書的雜食閱讀者，從暢銷小說、歷史類到大部頭文學經典；我們做畢業設計的那個階段，她的床頭書是蕭洛霍夫一千多頁的《靜靜的頓河》，有時我會纏著她請她簡介劇情，讓她很不耐煩。

她父母買了一輛車讓她在台灣開，我當然就成了吃軟飯的男友；她跟我同居，但是她父母來台灣時，完全沒有要跟我們家發生任何關係，當作不存在；還有她非常不能忍受台灣當時的衛生習慣和公共空間的髒亂。這個很直接的階級差異經驗，是否增加了我後來的階級情感？顯然尚未清理。她身上的反文化元素，形成了對西方主流文化的俾倪，這又應該增加了我去接受解殖價值觀的信心，因為有西化女友的背書，好像已經有了來自殖民母國內部的反叛力量盟友。

印象中大約在1977年底或1978年初，很少被淡江學運史提及的、屬於後李雙澤時代進駐動物園的建築系怪咖學長陳元彰，找我和K到他彰化老宅，當時余秉中導演找了張照堂擔任攝影、舒國治編劇——不確定林洲民是不是劇照——拍攝彰化秀水的陳家老宅，後來和美濃的素材一起剪接成《古厝：中國傳統的建築》⁸，我和K算劇組裡的義工。陳元彰是比應屆畢業生年齡大、有社會經驗、煙癮超大、氣質和其他學長完全不一樣的怪人，現在回想起來，完全不理解他為何成為動物園的成員？據他自己說他是彰化陳宅最大產權的一支代表人，他的語言和行為模式從現在看就是超級「台派」，算我在文青圈外第一個接觸較深的社會人士。

1978年暑假，K回印度度假，我被夏鑄九徵召去板橋林家花園進行修復測繪，被分到和逢甲建築系的符耀湘同組，負責來青閣二樓東側的測繪。符

8 該紀錄片有限的資訊見：https://tcdrp.tfi.org.tw/showmovie.asp?Y_NO=7&S_ID=146

耀湘是夏鑄九在逢甲的學生，也是蔣勳的粉絲，也認識陳映真，大學時就已經少年老成，對建築專業已經有很不同的看法，對未來生涯也有非常強的走自己路的企圖心；認識他對我後來的生涯選擇也產生了重大影響，這個影響在寫博士論文自傳研究時才開始察覺清楚。

在林家花園測繪的經驗，接觸了非常具體的建築領域裡的人文主義、反都市發展主義、反商品化和古蹟保存政策的辯論，也因為在左翼讀書會讀了 *The Social History of Art*，開始更關切建築的社會面向，特別愛啃似懂非懂的左傾Manfredo Tafuri⁹和Kenneth Frampton¹⁰的建築史英文翻印書，和鄉土建築圖集 *Architecture without Architects*¹¹，也會找自主營造 (self-help housing) 的文章來看。夏鑄九推薦的Christopher Alexander¹²，符耀湘、林洲民、李瑋珉當年都熟讀他的 *A Pattern Language*¹³，這本書當然是反現代主義和發展主義的，但我從沒有認真讀那本太厚的書。符耀湘還曾企圖想寫一本台灣版的「模式語言」，他說因此拍了很多有趣的空間角落的照片，其實我一直很期待看那些照片和讀那本從沒寫出來的書。但歷史很意外，最後卻是我真正貼身師從了大師在柏克萊的兩堂課（學到基礎木工技術的建築實作課，和很受挫的顏色哲學專題討論課），並讀了他的團隊在墨西哥市執行的自主營造建案寫成的

9 編註：曼弗雷多·塔夫里 (Manfredo Tafuri, 1935-1994)，義大利馬克思主義建築史學家和理論家。

10 編註：肯尼斯·富蘭普頓 (Kenneth Frampton, 1930-)，英國建築師、建築史家及評論家，現為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建築規畫研究生院威爾講席教授。

11 編註：繁體中文版譯為《被建築史遺忘的建築》(林憲德譯)，1987年由台北大佳出版社出版。

12 編註：克利斯托弗·亞歷山大 (Christopher Alexander, 1936-)，生於維也納，是美國著名的建築師、城市規畫師、作家和顧問，被譽為建築設計方法與電算機輔助設計領域的開拓者，但後來轉向回歸工匠傳統營造和空間哲理的探索。1963年起在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建築系任教，現為該系榮譽教授。

13 編註：簡體中文版譯為《建築模式語言：城市·建築·構造》(王聽度、周序鳴譯)，2002年由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出版。

書 *The Production of Houses*¹⁴。

然而1981年的暑假我又去了和傳統建築測繪價值相反的主流大師李祖原建築師事務所打工，除了那時K正在愛慕李祖原之外，我自己也對國際大師有好奇心，所以申請了暑期工讀，貼身觀察一個頂尖事務所的日常運作。後來我和K也選擇在淡江兼課的李祖原的合夥人王重平擔任畢業製作指導老師。王重平的專長是專案管理(project management)，也就是建築裡的企業管理，是資本邏輯滲透到專業領域的標識，而且王重平應屬於美式管理移植到台灣建築專業的範例人物。但他作為指導老師是很開放和隨和的，放任我和K做一個天馬行空的西門町電影中心。

我畢業後一路遠離執業建築師的生涯路徑，從沒有和王重平聯絡，但是2002年331大地震時，李祖原聯合建築師事務所設計的101大樓高空吊車墜落，奪走五個工人生命，當時擔任台北市勞工局局長的鄭村棋，要求101大樓立碑紀念，我是紀念碑籌建委員成員之一，王重平是事務所的主要代表，我們師生意外地在這種場合重新見面討論設計概念。我代表的工運方希望凸顯工殤紀念，但王老師代表的101大樓業主不希望為五個去世的工人在大樓前立碑，希望擴大到紀念全部參與興建的藍白領工作者；幸好最後的呈現萬人實名設計案讓去世的五個工人仍然保有受尊重的一區塊，使建碑計畫順利完成，沒有變成我和恩師的對立。

林 | 你在哪一個階段比較確定不會走建築專業，而走上運動的道路？

吳 | 正如前面所說，我畢業前那個階段，除了在林洲民和李瑋珉強大的設計能力陰影下，我對設計失去了自信，這個心理因素之外，又混雜幾種傾向的未定狀態，第一種是淡江動物園和夏鑄九影響下的鄉土和反發展主義；第二種就是對當時正夯的新銳建築師黃永洪、李祖原的好奇；第三種是很形式主

14 編註：簡體中文版譯為《住宅制造》(高靈英、李靜斌、葛素娟譯)，2002年由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出版。

義的前衛風，我和K在美學上喜好歐洲新理性主義的Aldo Rossi¹⁵和當年還沒有實際建案的德國O. M. Ungers¹⁶的空想設計圖，雖然他們都算要回歸歷史的反發展主義流派，但無疑仍然是很菁英取向的東西。

這些頗為混雜的思想和品味，到了退伍後進入符耀湘的工作室、去柏克萊的受教育經驗、和被左翼社群組織化，才逐漸確定自己不會走上建築專業路徑，到1987年回台灣前的想像(雖然空想)是以地下左翼政治作為志業，建築專業只是必須培養來作為社會包裝的工具性能力。1984年當兵退伍時，符耀湘和女友羅紅芝已經在台北市民生社區成立工作室，接室內設計和小型營造的案子。這是和正規建築師事務所很不同的取向，符耀湘希望直接有營造經驗累積，所以選擇遊走在建築師執照和建照外的非正式營造來執業。所以他會接的是小住宅翻新改建、商店裝潢這類案子，實踐將民間工法、業主參與設計和常民空間模式混合的一條龍營造方式，我的碩士論文*The Informal Sector in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in Taiwan: A Case Study of an Informal Contractor*就是以他的工作室為研究對象的。而我在他指派的工地裡一個鄰近三軍總醫院的二層住宅翻新改建案，中產階級小家庭的業主、極其有限的預算、工作室自己僱用的各種工班等，面對沒有制度規管的彈性和風險，惡雜瑣碎各種實務決定和交涉，體驗到的困難和多種可能性，再透過符耀湘的營造意義詮釋，都讓我對這種常民田野做好更多準備；這些經驗後來再經過柏克萊的政治經濟學訓練的重新理解，被更清楚地賦予政治意義。這第一件差事雖然讓我學習很多，經歷了初期的社會化，但也認識到自行創業的艱困；再對照當兵前在李祖原事務所的受僱經驗，那種和自己小康家庭社經背景過於遙遠的營造規模，應該都使我對建築專業不再有幻想，而一度空想走向建築史或建築理論的方向。

回頭看符耀湘的實踐也是自主營造的一種類型，屬於六〇年代運動遺

15 編註：阿爾多·羅西(Aldo Rossi, 1931-1997)，建築師、設計師，義大利理性主義建築運動帶頭人。

16 編註：奧斯瓦爾德·馬蒂亞斯·翁格爾斯(Oswald Mathias Ungers, 1926-2007)，德國建築師、建築理論家。

airiti

留的使用者參與式(user participation)精神，也和亞歷山大強調的回歸工匠師傅(master builder)傳統的路徑相容。如果現在問我左翼的空間專業精神是什麼？我大概不會只強調對地產資本的政治經濟學批判，或要求國家提供無產階級非商品化住宅這類層次，而是回到如何在實際營造體系內去專業化、反專業壟斷、將營建和設計的決定權及技術交還給一般常民。這個路線最成功的落實者當然是我們淡江前後期的謝英俊，他在全球左翼空間實踐都退潮時，在世界各地推動自主營造，而且還同時生產理論。這真是很有趣的環境決定論的反證案例：七〇到八〇年代受動物園左翼氛圍影響的建築系學生，沒有一個真正走上左翼空間實踐的，而當時完全在此網絡之外，在淡江美國式建築教育模式下認真當學生的謝英俊，十幾年後在921大地震重建的廢墟中，成功樹立了另類營造的全球典範，連他的個人造型也走回七〇年代的反文化風。

當兵期間，媽媽因為肺腺癌過世，在美國的K來信和我分手，退伍後我的心理諮商師是大一認識的韓良露，我們常像姊妹般地講幾小時電話，完全不顧喪妻的爸爸的觀感。去符耀湘工作室後不久，我發展了一段我稱之為「後母愛時期的無政府狀態」——因為愛你的媽媽走了，就可以不必那麼珍惜和保護自己——的戀情，和離家出走、若即若離的高職少女U整日廝混。出國前，韓良露委託符耀湘裝潢她東豐街的自宅，因此我遇到過她妹妹韓良憶、導演陳國富和滾石唱片的倪重華。韓良露訂閱自香港空運來台的《號外》雜誌，將新左理論和時尚美學並置，我常愛不釋手，這一定埋下後來我屬於比較歪的左派的遠因。

這次再回顧去美國前的生命歷程(上次回顧是2005年或2006年在香港寫博士論文時)，就發現很難用單一的政治性選擇來理解，它們應該就是多種情境的、未必有因果關係的生活世界。這也是組織工作困難之所在吧。到柏克萊之後，夏鑄九有意識地安排我選了幾乎所有系上的泛左翼課程，我也接受了，這當然使我從理論認識到實踐都真正離開了台灣主流建築專業，但是我相信前面多重的因素是非常重要的。

林 | 談談去美國後被發展出來的左翼運動、組織形式。

吳 | 到美國後的發展，也許要分兩部分來講，一部分是剛去美國遇到丁乃非（以及延伸的陳光興）對我產生的「軟」作用；另一部分是夏鑄九發揮的組織「硬」作用。也許可以先說之前比較沒有梳理過的丁乃非的作用，再來說夏鑄九的作用。

夏鑄九那時候是比我去柏克萊念博士班的，不確定是1982或是1983年，總之他先去柏克萊，我們後去。他跟陳明芳都會幫我們找好住的地方，我是1984年底到柏克萊，是學年中，所以只有我一個人，他們就沒有在外面替我找房子，安排我住進了校園裡的I-house（International Student House，國際學生宿舍），週末他們就會帶我去買生活用品、或是去逛逛，還有幫忙選課之類的，他都會弄得很好。

我住在國際學生宿舍，人生地不熟，不久就遇到同樣住在宿舍的丁乃非，她1980年起就在柏克萊念比較文學學士，我們認識時她是博士班的第一學期，通常這種老鳥不會住學生宿舍，但她因為沒有找到好的房子，就先住國際宿舍，我們很快就變成好朋友，經常一起在學生餐廳吃飯。那個餐廳採自助點餐的方式，點菜的方法和用語都是她教我的，其實除了她帶著我點過的菜之外，其他我都不會點，也從沒吃過。她應該並不認識夏鑄九，但因為我有文青底，她正在念比較文學博士，就有很多話題可以聊。她當時的老師都是非常有趣和政治性很高的新左翼文藝理論和性別理論學者；她又隨父親丁懋時出使非洲時，在法語非洲長大，能說寫流利的法語，所以視界非常另類。她很快地讓我進入柏克萊的歷史背景、六〇年代反文化現象，和幫助我認識美國、認識舊金山灣區的文化氣氛和校園裡外發生的事件，當然還有她專業領域的性別視角及後殖民理論，和她的左翼老師的軼事。陳光興在假期時會飛來柏克萊跟我們碰面，但因為那時他們沒有在外租屋，所以都只是短暫停留；當時他是德國法蘭克福學派和英國文化研究在美國的傳人的大弟子，所受的是新左媒體批判訓練，總是不斷地挑戰我剛開始繼承的傳統左翼階級分析。

airiti

陳光興不在的時候，我和丁乃非常跟研究前衛音樂的藝術史研究生、文藝風搞笑達人姚大鈞在一起混，¹⁷他後來成為中國美術學院跨媒體藝術學院副院長、開放媒體系系主任，當年他屬於去政治化的文青，可是丁乃非和他帶給我不同的文化價值觀，其實也是幫助我走向左翼運動的重要因素。丁乃非給我的性別和解殖養分事後看來當然非常具政治性，但她和姚大鈞綜合營造的反主流又充滿想像力的文藝氣息，鞏固了可以遠離主流而走自己的路的信念，或許就是井迎瑞所稱的理想主義元素。我這個部分在台灣時已經存在，但是去到美國，以一種國際視野來肯認，在我這種文青身上是重要而獨特的經驗。

夏鑄九應該不會承認他對我們的組織方法就是共產黨做群眾工作的「同吃、同住、同睡」方法……這是我2005年在香港報告我的自傳研究論文的時候，講到夏鑄九和蔡建仁幫我們找宿舍、一起買菜和安排暑期打工時，大陸來的同學就直覺地說：「那就是共產黨的組織模式啊，沒想到共產黨這一套果然有用耶！」夏鑄九或許是自己發展出來的做法，但確實是從生活面到思想、再到組織面都要兼顧的方法。

我在柏克萊修課一學期之後，1985年7月放暑假時，就被夏鑄九安排到芝加哥打工，因為我第一學期修了Alexander的營造實作課程，學會了美國木工DIY各項工具的基本操作，所以請我去協助在籌備開設士林書店的林孝信，進行設計和裝修工作。這就是第一次和OSDMT的深度接觸。暑假結束我從芝加哥回柏克萊前不久，王蘋和郭文亮就也到柏克萊了，夏鑄九已經幫我們找好房子了，郭文亮和另一個景觀系的女生葉芸住進I-House，我跟王蘋，一起住在一棟有好幾間房間的兩層木造屋(house)，裡面已經住了王蘋的景觀系學姊汪荷清。葉芸可能也是夏鑄九想要影響，但是後來她對公共事務完全沒興趣。

我和郭文亮是建築系，王蘋和葉姓女生是景觀建築系。夏鑄九後來坦承，他安排我和王蘋住同一棟房子，就是有意湊合我們成為革命情侶，也的

17 王蘋記得姚大鈞曾經拿蔣宋美齡錄音的黑膠給大家聽，但是我忘記了。

airiti
確意外地成功了，算組織工作的一大豐收吧！

林 | 你跟夏鑄九在柏克萊的時間有重疊嗎？

吳 | 當然有重疊，他當博士生，我是碩士生。剛說過我是1984年底到柏克萊，他是1986年回台灣，那段時間跟他都重疊，超過一年以上。

林 | 讀書會也都是在柏克萊那時候形成的嗎？

吳 | 在美國參加了很多不同的讀書會，從柏克萊開始，到芝加哥、洛杉磯，再到紐約都有，長期的或短期的。印象中在柏克萊反而沒有固定的讀書會，只有外地「大頭」(林孝信、蔡建仁、許登源這些)來柏克萊時，會在夏鑄九家安排密集的討論會；「大頭」不在時，夏鑄九和陳明芳夫婦影響我們的方式，大部分是日常見面時的討論，我們固定的聚會包括：週間他們帶我們一起去上課、週末開車帶我們去一起買菜，通常買菜後會再一起吃飯，有時會安排我們做報告。我們每一個剛到柏克萊的台灣學生，他都會幫我們找房子，推薦我們該修的課程，像Castells¹⁸的課我們都是一起修的。其實我們去以前，他已經修過Castells的課，他陪我們再上第二次、第三次，每一堂我們都用卡式錄音機全程錄音，他錄一份、我和王蘋也錄一份，那些錄音帶現在都不知道放到哪裡去了。他回台灣後，「箴言社」裡有人有車，我們就自己去買菜了。我要說的是，夏鑄九都是在買菜、吃飯和下課時影響我們，這個作用絕對不比讀書會小，因為都是對當下的困惑和現實狀況最及時的反應。

林 | 《資本論》是在哪時候念的？去洛杉磯參加讀書會是哪一年？

18 編註：曼威·柯司特(Manuel Castells, 1942-)，都市社會學學者，當時任教於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環境設計學院都市與區域規畫系與社會系。

吳 | 真正密集的《資本論》第一卷讀書會是在洛杉磯，不是在柏克萊。有點不記得是等到1985年開學，王蘋和郭文亮來柏克萊之後的第一個寒假我們一起去的？還是她們來之前，我在1985年初就去過洛杉磯了？但我確定參加過不只一次的讀書會，就是那種總共有七、八天的讀書會。也可以確定我們三個人在1986年暑假再去洛杉磯打工的時候，小蔡(蔡建仁)有繼續在帶非正式的讀書會，所以《資本論》比較有系統的閱讀和討論是在那個時後，都以第一卷為主。我也是那個暑假認識井迎瑞的，但是他沒有來讀書會，可能已經是老鳥，更可能是保護他的身分，因為要回台灣進電影圈就不能有鮮明的政治色彩。

印象非常深刻的一次，是夏鑄九開他的金龜車載我們南下去洛杉磯，車上有柏克萊的五個人，我、王蘋、郭文亮、夏鑄九跟陳明芳；抵達洛杉磯前，在北邊山區的高速公路上開始飄雪，然後金龜車的雨刷竟然也故障，夏鑄九是頭趴在方向盤上，從擋風玻璃一側的下緣隙縫看出去開車的，驚險萬分。按此推測，應該就是1985年底或1986年初的寒假比較有可能。地點是王義雄和張梅梅家，我記得沒錯的話，應該是由李義雄(顏朝明的化名)帶的，蔡建仁有點像助教；讀書會中間時候許登源從紐約過來，像特別指導的角色。印象中那一次好像還有別人來加入，但不記得是不是鄭村棋和夏林清夫婦有來加入一小段？

參加「台灣民主運動支援會」(OSDMT)

林 | 接下來的訪談就以OSDMT為主，包括它串聯、結盟的社群。還有一個部分需要你補充，就是夏鑄九跟老林的關係，以及夏鑄九引介過哪些人到林孝信的支援會這一邊。

吳 | 夏鑄九跟林孝信之前的淵源我不是那麼清楚，在美國那段時間，每個人的政治關係還是非常敏感的資訊，都必須用假名行走江湖，夏鑄九或其他左翼社群的人絕不把其他人的背景告訴新人的。夏鑄九從柏克萊「吸收」

去OSDMT的學生，就是我跟王蘋兩個人而已。還有逢甲建築系畢業的郭文亮，他和王蘋同時到柏克萊，我們三個是跟夏鑄九最接近的學生，但是郭文亮只去了洛杉磯，忘了為什麼他都沒有機會去芝加哥？

林 | 在台灣就認識他們嗎？

吳 | 不認識，雖然都是建築系學生，可能見過面，但不認識。王蘋那時候在夏鑄九的城鄉所(那時候叫「都市計畫室」，簡稱「都計室」)工作，她有一個好友在那邊工作過一段很長的時間，所以我們或許見過面，但並不認識。我和王蘋第一次通電話，是她到柏克萊，夏鑄九帶她去看了後來我們一起分租的房子，她想要跟我換房間，打電話到芝加哥給我，結果我當時正在練習拒絕別人，她就這樣被拒絕了！¹⁹

當然在柏克萊的學生不只我們三個，還有很多，我剛剛在OSDMT通訊名單裡就看到一、兩個——我覺得我們都是夏鑄九準備發展的學生。我最先到柏克萊，1985年的暑假就被夏鑄九安排去芝加哥打工並參加夏令營。

然後等到王蘋跟郭文亮來的時候，寒假先去洛杉磯，也就是《台灣思潮》那邊參加讀書會；到了(1986年)暑假，我們三個人就被安排到洛杉磯，老湯的五金行去打工；然後1987年我和王蘋又去芝加哥士林書店打工。所以，我覺得夏鑄九是很清楚的，到柏克萊校區的台灣學生，他就會做判斷，要不要拉進讀書會？要不要進一步送到組織去？我覺得基本上是這樣。但所謂進入組織，是指可以參與較核心的政治討論而已，並沒有什麼可怕的入會或加盟儀式這類剛性做法。

記得1986年暑假快到時，夏鑄九跟我們(我、王蘋、郭文亮三個人)說：林孝信跟蔡建仁兩邊都希望我們到他們那邊去，因為吳永毅1985年去過芝加哥了，所以這次你們三個人就先去洛杉磯。然後夏鑄九回台灣後，1987年我和王蘋兩人又去芝加哥，或許是因為要平衡兩邊的關係。所以夏鑄九很清楚

19 這是2020年12月14日我打電話給王蘋確認「箴言社」成員的姓名時，她喚起的回憶。

airiti

地受到兩個組織的影響，就是洛杉磯系統的《台灣思潮》跟林孝信的OSDMT和《民主台灣》系統。到柏克萊的學生，他都會想辦法影響，然後把這兩個組織的關係引介進來。

林 | 除了你們三個之外，夏鑄九後來有發展出其他留學生的關係？

吳 | 我的理解是他直接發展成功的只有我們三個，另外就是我跟王蘋，到處東串西串，串出了「箴言社」。應該說「箴言社」其實是海外左翼團體透過我們要影響校園的社團，至少我和王蘋這兩個核心成員有這個動機。用現在的說法就是這個社團有附隨組織的成分，哈哈。

如前面所推測，夏鑄九對於去美國留學的學生都打算影響。但不見得能夠成功，例如當時還有兩個夏鑄九的學生：覃培雄和王維仁，但他們的名字我都沒有在OSDMT的通訊錄裡面找到。這兩個人都在城鄉所待過，修過夏鑄九的課，也是夏鑄九推薦他們到柏克萊的。他應該很想影響這些人，但是應該跟葉芸一樣沒有成功，後來就各自發展自己的專業生涯了，完全沒有走到運動裡面，也沒有參加我們的「箴言社」；王維仁還以省籍因素來批判「箴言社」的講座內容。

林 | 你印象中當時OSDMT串聯的盟友、社團，包括在台灣的有哪些社群？

吳 | 在美國的主要盟友之一當然是我也熟悉的《台灣思潮》，雖然他們互相之間也有較勁，反正是某種良性競爭。但是兩邊至少都會常常在討論中互相提到對方的名字。也會提到紐約的何青（許登源）、底特律的柳白（金寶瑜）。

林孝信也對許信良、洪哲勝很有興趣，如果印象沒錯的話，是不是我參加的兩次夏令營都有邀他們？老林跟我們的討論中也會提到這兩個人的想法。因為那段時間洪哲勝和從台灣流亡到美國去找洪結盟的許信良，都主張要走社會主義暴力路線的台獨，在海外台獨運動算是特例（1970年刺蔣案之後就沒有人主張暴力路線了），所以很值得觀察和對照。但林孝信幾乎沒有

聊到過自稱台獨左派的史明，其實洛杉磯那邊也幾乎沒有提過，我一直以為那是因為史明的影響力只在日本，所以美國的左翼社群不討論他。但2020年蔡建仁說他曾經從美國專程去日本拜訪史明，而且待了好像兩個月以上，史明很想吸納他，但是他對史明失望而返美。不知道林孝信是否也是類似的狀態，覺得轉向民族主義的史明不需要結盟。

至於OSDMT和聲援台灣的部分，或許和「夏潮系」和「前進系」比較親近，林孝信最會常提到蘇慶黎，但台灣來來往往受OSDMT邀請的人實在太多了。張俊宏、姚嘉文、呂秀蓮、蔡仁堅、莫那能、賀端藩、南方朔、柴松林等等，幾乎跨黨外的各個派系和早期社運人士。

「箴言社」的成員

林 | 你可以把「箴言社」再說詳細一點嗎？

吳 | 「箴言社」1986年成立，詳細的脈絡真的忘記了。但後來發展出來比較積極的成員，就是我跟王蘋一對夫婦，還有土木系博士班的曾大仁跟他太太劉佩玲，和土木系博班的黃世健和姜雅莉夫婦。其中曾大仁回台大教書，之後被提拔到交通部去做宜蘭雪山隧道，他是總工程師還是副總工程師我忘了。我們2014年協助國道收費員抗爭時，曾大仁剛好升為高公局局長，被我們抗議過，後來又升為營建署署長。這三對夫妻算「箴言社」最核心的成員。

還有一個後來跟老林比較有關係的就是孫春在和傅靜夫婦（傅靜當時已經就業，較少參與校內活動），孫春在是搞資訊科技的，回台灣後曾是數位典藏計畫的負責人，和老林一起創辦新竹青草湖社區大學。但我記憶中他們在美國沒有接觸，只是「箴言社」邀請林孝信來演講時認識，就成為老林回台灣以後，跟他合作最深的「箴言社」成員。後來又有謝國雄跟蔡佩珍夫婦加入，但我去柏克萊的時候，謝國雄應該就已經在了，只是稍晚之後才加入社團。

林 | 你們為什麼會去找謝國雄？

airiti

吳 | 不記得了，可能就是辦活動他會來，他又是泛左翼學者Burawoy²⁰的學生，或許有共同話題。社團一開始發起一定是我跟王蘋、曾大仁、劉佩玲和黃世健，謝國雄不算第一批，他沒有跟著創社，但相對是比較早被我拉進社團，也是因為他比較願意參與公共事務，跟著我們辦活動。

林 | 可以具體說一下你們辦了哪些活動？

吳 | 主要活動形式就是舉辦公開講座，然後有迎新，是不是有期末聚會就不記得了。邀請的對象主要就是和OSDMT合作，因為和其他幾個左翼網絡比較，林孝信的網絡比較廣，他會邀請一些台灣黨外人士來美國參加夏令營，聽說我們回台灣後也會邀大陸學者，但是還是以台灣來的人為主。正如前面提到的各種各樣的黨外人士，看OSDMT這個名單就比較清楚了。通常洛杉磯《台灣思潮》那邊也會幫這些人買一張機票，就請到洛杉磯去。很多人就會在這期間到柏克萊，「箴言社」就會在這個網絡裡面幫他們辦校園演講活動。

簡單地說，我們有OSDMT的支援，所以可以邀到各種來賓；然後我和王蘋的主要認同對象又有洛杉磯的《台灣思潮》，人際網絡和資源就會互用。

除了來賓演講外，「箴言社」沒有辦過左翼讀書會，但幾個在美台灣人左翼社群的大頭來時，我們會辦小型非正式聚餐討論會。譬如說林孝信或者蔡建仁，比較常來就是這兩位，印象中蔡建仁好像比老林來得還多一點。還有阿肥(丘延亮)也曾被邀來演講，許登源和金寶瑜好像也來我們校園裡面演講過，所以各派系都有。

20 編註：邁克爾·布若威(Michael Burawoy)，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社會學系教授，勞工社會學領域最重要學者之一，「社會學馬克思主義」的旗幟性人物，始終堅持「階級」分析的視角，主張將階級帶回社會學研究的核心。曾以參與觀察的方法在尚比亞、美國、匈牙利和俄羅斯的多個工廠當過工人，在此基礎上完成的勞工研究對馬克思主義傳統下的勞工研究產生了深遠影響。

阿肥那次的講題，就是他後來發表的〈兩種知識分子〉²¹。他文章好像是剛寫完，他來講了這麼一場。林孝信那場應該是1986年，因為「箴言社」成立找他來演講。林孝信講「從海外看台灣自由現象」，但蔡建仁講什麼我不太記得了。

記得我和王蘋也會負責去接演講來賓，印象比較深的是呂秀蓮。「箴言社」替她辦演講，我開車到好遠好遠的地方，可能是矽谷，推測她就住在某個獨派系統的人的家裡，我們去開車接她來柏克萊，然後演講完再開車送她回去。我忘了是誰交代的，總之是說呂秀蓮剛得過癌症，身體不好，開車要小心。我們好像也去接過姚嘉文。

「箴言社」的成員除了剛剛講的那些人，也有比較偏獨的學生會參加。因為當時柏克萊只有一個台灣學生社團，國民黨控制的社團已經不運作了。聽說七〇年代末國民黨的社團很活躍，但是到我們的那個階段，每年除了辦一次新生聯誼會，會去外面租一個像club的場地，烤肉什麼的，幾乎沒有任何公開的社會性或政治性活動，所以校園裡面唯一活躍的台灣人學生社團就是「箴言社」。

記得有一個比較積極的學生是林萬億的學弟。林萬億那時在柏克萊念博士，比較和美國獨派來往。因為「箴言社」的來賓是從老林從這邊介紹來的，包括獨派也支持的黨外人士，所以獨派學生也會來聽演講。林萬億知道「箴言社」不是國民黨控制的社團，對我們就沒有那麼排斥，如果演講來賓是比較接近獨派，他們就會積極找同學來參加，基本上沒什麼太大衝突。他們也知道我們是不同路的人，不會來參加核心會議；我們也知道他們是不同系統的人，但是就在一個社團平台合作。

還有社會學系的傅立葉後來也來參加「箴言社」，她跟王蘋和丁乃非很好。丁乃非跟我和王蘋很要好，但是不在「箴言社」脈絡裡，或許是要顧慮還在國民黨外交體系內的爸爸丁懋時的看法。陳光興只有暑假才來柏克萊，也不在社團脈絡裡面。

21 丘延亮(1995)〈兩種知識分子〉，收入丘延亮(1995)《後現代政治》，台北：唐山出版社。

「箴言社」的「另類發展」

吳 | 「箴言社」為什麼可以發展那麼久、而且關係很穩固？它有一個物質基礎，「箴言社」後來發展兩個很有意思的東西，應該也算是受了社會主義的影響，所以實驗另類模式的東西。

「箴言社」發展出兩個留學生的生活方案。一個就是 food pool (共食)，怎麼發展出來的？應該是曾大仁提議，我記得有次他講說，舊金山那時候有鼓勵共乘 (car pool) 政策，多人共乘一輛車進城的話，昂貴的過橋費可以減收。曾大仁說：人家有 car pool，我們從生活面也來發展其他 pool 的模式。我覺得這是很有意思的東西，因為留學生沒有錢去吃外食，三餐都是自己做飯，每天做很累。所以我們那時候發展一個模式：大家每個週末見面，每人做一道菜，份量要夠六人份或七人份 (看當時參加的人有多少，人數也不能太多，因為每個人做不了那麼大的份量)。第一份可以大家拿出來當場吃，吃完剩下的就各自帶回家。比如滷雞腿，要做七人份，就要滷七隻，當天見面就先拿出一隻當晚吃，桌面上就可以有七道菜；剩下六份就是分給六個人帶回家，其他六家也是這樣，當晚就可以帶回家六樣別人做的菜，那一週就不用再做菜了。我覺得這個形式很棒的，是集體互助，又自由、又有實益。而每週見面一起吃飯，可以同時討論社團要辦什麼活動、校園有什麼狀況、台灣有什麼新聞等，我和王蘋當然也會趁機講一下芝加哥和洛杉磯的指示方向。

林 | 等於是傳遞洛杉磯和林孝信那邊的訊息？

吳 | 對，它算是一個基礎很扎實的社團，至少發展出七、八家。王蘋說我走了以後，大概發展到九家還是十家，好像還有一個中國大陸來的學生。總之，它有公開活動、它有實際生活機能、它引介兩個系統的人際關係、它也有思想交流，所以它算是一個很成功的社團。

陳瑞樺 (以下簡稱「陳」) | : 你剛提到有兩個基礎，一個是 food pool，另外

一個是？

吳 | 另外一個是我走了以後他們發展出來的「信pool」。社團成立兩年多後，核心的社團成員開始有人要回台灣，或者畢業以後到別的州去工作。那時候還沒有Email，所以要寫紙本信，麻煩的是我寫一封信給曾大仁，其他七個人是不是也要寫一封？所以他們就發展一個循環紙本信的系統。這部分我沒有參與，怎麼操作要問參與過的成員。我在香港寫博士論文時，王蘋有把她自己保留的一份交給我，現在還埋在三芝的文件堆裡，希望儘快整理出來，就可以提供給大家看是怎麼運作的。

林 | 是影本？

吳 | 對。具體如何操作和流通我不確定，應該要問孫春在，他是發想人。他們在柏克萊留得比較久，信pool也發展了一陣子，有點像現在的line社群。

所以這社團算蠻有意思的。而且我們「箴言社」的指導老師是李遠哲。李遠哲跟海外反國民黨的網絡有關係，但那是什麼樣的關係我們搞不太清楚，總之我記得是蔡建仁透過網絡去問他的，聯繫上以後，好像是王蘋跟曾大仁去找李遠哲，李遠哲就答應做社團指導老師。但他也不會管我們，就是掛個名，他那時候非常忙，已經兼任行政職，執行副校長之一。他擔任多久的指導老師？至少當過一年。我們社團每年會有社團大會，他都會來支持。至少應該有兩年吧，我是在那時候認識李遠哲的，雖然回台灣後就再也沒找他。

「箴言社」算是林孝信和蔡建仁網絡發展比較成功的校園組織。像在芝加哥也發展了一些學生，可是在校園中並沒有搞出社團。原因之一是遇到像曾大仁、劉佩玲、黃世健或孫春等，都算是積極、有能力、認真、容易達成默契、個性上都算很好相處的人，最主要是王蘋的人際關係活絡能力，才能湊在一起，算是做了一些蠻有趣的事情。

我回台灣之後，開始有大陸留學生來美國，所以後來「箴言社」裡面也有大陸來的學生。我記得是1989年，他們跟林孝信就合辦了一次工作坊，類似

營隊的形式。

林 | 你離開以後，「箴言社」持續跟這兩個組織保持關係？

吳 | 應該是林孝信這邊比較有可能，因為洛杉磯那邊的主要對外聯繫人物蔡建仁也回台灣了。猜想孫春在後來有跟林孝信聯繫。但是我和王蘋之外，都沒有其他人被影響而參加左翼陣營，我覺得他們關心台灣社會，然後批判國民黨、認同黨外，甚至是認同民進黨的民主運動，這些都OK，但是沒有進到信仰社會主義的階段，更沒有深入到可以帶進《資本論》讀書會的程度。

林 | 所以在「箴言社」的成員裡面，有誰進到讀書會裡的？

吳 | 就是我、王蘋跟郭文亮三個人。丁乃非跟陳光興應該還算是林孝信跟蔡建仁的觀察名單——大家就覺得是盟友沒有問題，但因為丁乃非家族的國民黨色彩太強，不敢把他們邀進來，比較是這種狀況。老林或蔡建仁到了柏克萊，如果丁乃非和陳光興他們在的話，會找他們來聊聊，但是讀書會不會找他們。

林 | 這樣聽起來，「箴言社」的成員，最後會被單獨派往這兩個組織的，基本上已經是被認可，在左翼的認同上已經被確認了。

吳 | 對，那個戒嚴時代當然是組織上覺得比較安全才會進讀書會。我相信夏鑄九會跟兩邊的人匯報哪些學生已經達到可靠程度，他們再一起判斷，我猜想夏鑄九的訊息最重要，因為他跟我們生活在一起。

我們比較核心的讀書會、涉及政治判斷的討論、涉及組織關係(誰去夏令營這類)，曾大仁、孫春在、謝國雄都不可能進來，會參加的就是夏鑄九、陳明芳、王蘋、郭文亮。

士林書店

林 | 談談你對支援會運作的理解，比如關於《民主台灣》這份刊物……

吳 | 1985年我自己去老林那邊打工一個暑假，再過來是1987年我跟王蘋一起去打工。基本上都有任務，一個暑假就要完成一件事情。

1985年我是去協助籌備士林書店，所以例行的支援會事務我反而很少參加，主要是跟老林在弄書店的事情。然後我遇到舒詩偉，也遇到阿肥，我大部分時間都是在弄書店，之外就是讀書會、參加夏令營。1987年，王蘋去做書店的收銀員，我的任務就是協助籌備夏令營跟研討會。在我的印象中，發行刊物我比較沒有參與到。我跟王蘋、還有郭文亮，我們只會收到《民主台灣》刊物，不會收到更內部的通信。雖然我們到了芝加哥，也算很核心的成員，但並沒有參與《民主台灣》的編務。

林 | 講一下士林書店，雖然你的書已經提了一些。

吳 | 1985年暑假，因為我已經修了亞歷山大的實作木工課，所以夏鑄九就說：「你會做木工，去幫老林搞書店。」但我這個木工菜鳥，只會那幾樣簡單工具，怎麼去？他說：「沒有別人更好，你就想辦法把它弄起來。」

到了那邊，老林才跟我講書店要怎麼籌備，發現仍是個非常初期的狀態。他在芝加哥大學附近看到一家白人開的五金店，白人要退休了，店面面積很大，因為老闆要退休了，所以沒有整理，非常亂。老林把那個店租下來，然後要拆除原裝潢、組合書架、申請營業執照、進口中文書等等。但是我們什麼都不會，等於是從頭摸索。我跟著他翻黃頁電話簿，找各種各樣的廠商、政府機關，然後打電話去問怎麼辦。有的他自己會去辦，有的我陪他去辦，或者去買一些東西，大概有一個半月吧，都在跑這些東西。同時他講需求，我幫忙畫書店的平面圖，他再調整。規畫好了以後，就開始跑了很多芝加哥的書店，參考要用哪一種書架，我再估價和評估能不能用手工做出來

等，開始買材料時暑假已經過了一半。

為了存放買回來的材料，租了附近黑人區的房子，一樓給我住，地下室當木工場。本來老林期待是可以清空五金店，然後把木料放進去現場工作。但是房東不願提早清出來，我算算那麼大面積的書店，要在一個半月完成書架組裝實在太困難。我跟老林說暑假不可能完成，只能盡量做一些出來，再找別人接手。

我按照平面圖，把書架總量算出來，然後木料、工具全部買回來。木作需要的臨時鋸床，室內裝潢木工會搭的那種，我也幫忙做好了一個。就是按照我在台灣監工的經驗，加上亞歷山大實作課上學的，反正就拼湊出來了一個。

印象中我把所有木板都切割好了，挖槽和挖榫溝部分，也做了大部分，但是都沒有拼起來。我回柏克萊時印象中五金店還沒有搬空，所以還沒辦法粉刷，這個書店是什麼樣子有做出來，我組裝了一個還是三個作為示範的書架，然後把書擺了一些上去。其他的東西全部是按照不同的編號，放在我們租房子的地下室。按照呂欽文寫的，後來是阮慶岳進來，應該也是用我那個房間加上地下室繼續工作。

林 | 就你的理解老林為什麼要成立士林書店？

吳 | 就我的理解，除了他自己的生涯轉換，應該也有運動轉型的因素，但來不及跟他討論，他就匆匆走了。我覺得主要還是跟他個人的狀態跟整個大環境有關。如果從保釣開始算到1985年，已經好多年了，1970年年末的時候他就已經開始了；如果從大家開始捐錢給他算，也已經都七、八年了，然後他結婚了，所以他自己在運動生涯選擇中，也有不同的考慮，也是一點。

總之我在芝加哥的那段時間就有很多這種辯論，就是海外到底還能做什麼？人家島內都已經怎樣怎樣，有很多這種辯論。我覺得也會影響到他在海外到底要做什麼的考量。印象中他打了非常多電話在討論這種事情——支援會到底要扮演什麼角色？究竟要不要搬回台灣？……

airiti
林 | 你們那時候住一起嗎？

吳 | 沒有住一起。我記得剛去是住在老林那邊，因為一起弄書店，但也只有那段時間我整天跟他在一起。三個月中有次許登源來，還被他帶去陳津渡的研究室。阿肥也是老林介紹我認識的，還有舒詩偉。

林 | 那一段期間有沒有任何的訊息流通？

吳 | 當然有，有老林帶的討論會。但是像呂欽文寫的《資本論》讀書會，我印象沒有太深。可能有，但是時間也許不是那麼長。有定期的討論會，老林會找大家來談一些問題。

從我的角度，他跟洛杉磯《台灣思潮》讀書會就比較不一樣。他會比較針對時事、政治歷史、社會主義發展史，從這個比較現實的角度去討論。洛杉磯的許登源相對就會從抽象理論去討論，所以我覺得比較不一樣。所以即便有帶過《資本論》讀書會，老林也都是比較討論社會主義發展的歷史上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這對我的啟蒙比較多。

那時候我們在弄書店，沒事就會開車去買東西，整天談怎麼搞房子這些。討論的話也比較針對時事，比如他會跟我講美國的狀態，怎麼看美國這些事情，然後中國大陸、台灣。他啟蒙的方式，或至少對我的作用來說，跟小蔡比較不一樣。小蔡是分析尖銳，然後把一個事情變得極端化、抽象化去分析，這是小蔡的長處。林孝信就比較是討論實際社會上、社會發展事件背後的結構是什麼，他比較會講這些。白天我們去買東西，晚上可能會工作或不工作，他在那邊煮大鍋麵，然後就會開始聊。像呂欽文下班後也會來聚。有時候就是兩、三個人，週末人多的時候會有六、七個人。

1985年或是1987年暑假，有我、呂欽文。呂欽文應該算是比較常出現的。還有兩個女生，但有點記不得時間的順序。她們應該都跟老林跟蠻久的。一個姓陳，夏令營辦活動或幹嘛她就會來，很認真工作，高高的一個女生。另一個姓李，也是志工型的，讀書會她不會來，但是平常老林這樣煮

airiti

麵、大家開始聊天，談一些時事，這些人就偶爾會出現。然後講著講著就會開始談到一些活動分工——這是老林的工作方法——大家就認領了一些例行的支援會雜務。我印象中這兩人其實在行政雜務方面幫了很多忙。老林身邊會出現一批人，就是不會真的被他的左翼信仰影響，但就很認同他這個人，老林要做什麼事，說一聲他們就會去做。像是他們的精神導師，包括後來在台灣也是這樣。跟他／她談左翼那些，一聽就知道不是搞左翼的，也不太像是左翼。可是老林叫他／她做什麼，他／她就認真在做。老林就有這個辦法，我也覺得很奇妙。

老林那時候還想影響誰呢？就是蕭裕正。我記得舒詩偉、阿肥、還有我，都跟老林講不要，不要白費力氣，人家是「新潮流」影響的學生，他不會被你影響。但是老林就是一腔熱血，很多討論會他會找蕭裕正來。蕭裕正也會來，回台後他就變「新潮流」，當市議員，後來做到什麼局長我忘了。他那時候好像是芝加哥大學化學系。1985年的時候，蕭裕正常常被老林邀來，那時他單身漢，我在〈相簿〉那篇文章說我們都是荷爾蒙時期，他也會跟我們鬼混。

我跟呂欽文、蕭裕正，老林跟我們聊完天，談完正經事以後，我們可能會到密西根湖邊去繼續夜談。還有一個女生程其芸，是念芝加哥大學經濟系的，雖然有男朋友，但仍混入我們這個荷爾蒙圈，不屬於老林工作圈。我記得夏令營的時候李、陳和蕭裕正都有去，所以表示林孝信——蔡建仁也是一樣——那時候就覺得比較有一些社會正義感的人，他都想影響。

蔡建仁在很多「新潮流」的人身上白忙一場。譬如說賀端蕃，他覺得這個人一定可以拉過來，花了無數力量，坐了不知道多少次長途巴士，或是開車去找賀端蕃。而且常常回來跟我們講說：「哎呀，已經搞定了。」結果完全是一場誤會。我記得很多人跟他講說，賀端蕃不可能被影響，雖然人家很厲害，但是他不會被你所用，不用花力氣。但是他就覺得一定可以，後來就白忙一場。那時候賀端蕃讀書的地方比較靠近LA，他都要花時間去找他，跟他促膝長談。蔡建仁跟林孝信都有這個狀況，有點機會他就會花很多力氣，很多特別是「新潮流」的，他們都想把這些人拉過來，都白忙一場。

airiti

林 | 那是不是你的位置跟呂欽文差不多？——都是夏鑄九派過來的，你們兩人的位置有什麼差別？我說的是政治位置，但聽起來阮慶岳就不是。

吳 | 對，阮慶岳應該不是，阮慶岳是剛剛說的外圍，就像陳、李。但呂欽文絕對是界線內，可是他跟老林具體關係怎樣我不是很清楚，因為我只有一個暑假在。就我在的那個暑假來說，他應該比我邊緣，因為他白天在建築師事務所上班，只有晚上有空來，但是我整天跟老林在一起。但是我離開以後，呂欽文還是長期跟老林工作，他一定是在組織界限內，我覺得不是問題。因為他跟王津平有很深的關係，所以他搞不好還有王津平的線。他在淡江的時候，絕對比我更核心——他是組織界線內的，而我反而是沒有那麼界線內。所以你應該要問他，他是夏鑄九還是王津平介紹去的。搞不好是王津平這個線。就組織關係上，他一定是OK的人。

呂欽文也是很有趣的人，但是他回台灣後我們關係就漸行漸遠了，他是比較認同老林左的這一塊，但就是忙著他的專業。工黨籌備運動時呂欽文應該有過運動傷害。他回台灣以後，被工黨找去，有沒有支薪我不確定，但是是非常核心的成員。工黨成立應該是王津平找他去的。他回台灣以後，整個工黨籌備會他都有參與。可能組織黨綱不一定有參與，但是美工部分，工黨成立後面的大背景是他畫的。因為搞工黨，所以他跟王菲林很好。後來工黨分裂，選舉失敗，我覺得有傷到，所以勞動黨他就沒有再參與了。這段應該去問他。如果他是從這個脈絡被影響的話，而且他後來繼續參加了工黨的籌備，工黨失敗分裂以後，他才回到他的專業去，很認真去搞他的專業。

林 | 他受訪時有提到，說他還是很想像夏鑄九一樣，希望在他的專業裡發展。他現在還想要寫小說。就是希望，對他來講，這應該是生命底處的一個印記。

吳 | 對啊，我覺得他是一個有趣的人。

夏令營

林 | 說說夏令營的運作。

吳 | 因為我是書店為主，夏令營為輔。所以我印象中好像沒有在裡面。夏令營確定在什麼時間、地點、議程都決定了，我才去幫忙。就是從書店籌備中被抽出來去幫忙。

夏令營對我說來，它發揮很大作用是：把偏左的、泛左的人，透過大型集會聚集在一起——當時幾乎沒有這樣的活動。要不然就是以獨派為主，獨派那時候比較自願。國民黨那時候幾乎也不太運作，1980年底在美國幾乎沒有什麼活動。要不然就是同鄉會、或FAPA(台灣人公共事務會)，他們會有活動。再過來就是支援會的活動，如果不是獨派、也不是國民黨的，大概都會在這邊。支援會又會找一些黨外運動的人，再加上台獨左派的人，以洪哲勝為主，洪哲勝把許信良帶過來。

林 | 夏令營主要的工作人員，除了林孝信之外還有誰？

吳 | 比較是他們在討論，或者是聽他們討論，像舒詩偉、林孝信，外圍是阿肥。阿肥比較不參加夏令營，但是他會去幫忙，成形以後，就是整個討論完以後，阿肥至少也是會去參加。不一定每一屆，但是我去的那兩屆，他應該都有參加。他會被找來幫忙。在夏令營的位置，我跟他比較像，比較參與討論的應該是舒詩偉跟老林，還有一些在芝加哥支援會的人，像陳津渡或陳杏村都是老林比較常提到的成員。他們在支援會的位置我不清楚，但是至少我啦，老林會說什麼事去找陳津渡問一下。因為距離很近，陳津渡就住在芝加哥，也是大學附近，他在另一個學校教書，不是芝加哥大學，總之他也住在附近。

有時候他會找木口，後來我才知道是陳杏村，在芝加哥附近的話，工作團隊應該就是陳津渡、陳杏村、舒詩偉，我覺得是這樣。阿肥是比較外圍

airiti
的，阿肥跟我講 1984 年的夏令營他去當廚師還是什麼，說他負責炒大鍋飯。

林 | 描述一下你對夏令營的印象。

吳 | 算是離開台灣到美國後第一次看到各種各樣海外的運動人士。在柏克萊最多只有少部分的人來一下而已。在夏令營都是大頭：許登源、蔡建仁……林孝信我不知道之前有沒有，之前好像應該沒有。我應該是到了芝加哥第一次碰到他。總之第一次看到那麼多「人物」就是在夏令營，而且是在不同專業，每個人都是很奇怪的專業，各行各業的專業都有，搞科技的、人文的，但是大部分都是科技的，我覺得的確會有一種社群感出來。但是年輕人不多，當時就是我跟王蘋這些人——我說的是學生，像我們這輩的沒有，比我們大的就是鄭村棋、夏林清、卡維波、何春蕤。鄭文松不算，那時候他好像已經工作了，剛畢業不久。

到 1987 年我常常跟王蘋講說，之前發展這麼多年，怎麼只剩下我們這些人，我們是怎麼搞的？留學生被影響的真的很少，幾乎沒有。可以再問一下王蘋，但是我覺得不會超過一兩個，幾乎沒有。有發展出一些外圍的關係，像剛才講的「箴言社」成員。但是那些人，第一個，到底要不要找他／她去夏令營？第二個，他／她會不會去參加？這都是要考慮的。

林 | 夏令營是開放的嗎？

吳 | 半開放，它的界線比剛剛說的讀書會更鬆一點。但它畢竟還是有些界線。第一個是邀不邀他，第二個是邀他，他也不一定會去，要跑到五、六天啊。

林 | 像這樣的活動訊息，支援會會不會發給「箴言社」——就是你說的還沒有發展的人？

吳 | 我覺得應該有，我覺得他辦夏令營應該已經在發展了，像卡維波、何春

蕤、鄭村棋、夏林清……但真的沒幾個人。但從另一個角度看，夏令營也蠻成功的，這些人都留下來了。保釣的人不少，應該超過四分之三以上，比鄭鴻生、鄭村棋他們再大一輪的應該都是保釣。

夏令營基本上就是老林影響的脈絡，他是《科學月刊》加保釣，這樣一個脈絡。另一個就是邀請來的來賓，台灣或者海外其他地方來的。第三種就是像我們這種，就是老中青三代的學生。老一代的話就是鄭鴻生、瞿宛文，算老一代，再過來鄭村棋這些人，小的老卡(卡維波)。我們這一層好少，真的好少。我也還沒真的仔細問過老林和小蔡，他們可能也說不出所以然來。

林 | 「LA派」²²那邊人會來參加嗎？還是事後拉過去那邊？

吳 | 「LA派」不會。小蔡我記得有去過，可能關係上他也想代表一下，順便拉人。基本上不會大舉來參加，不是這個狀況。

林 | 所以夏令營這個社群感怎麼形成呢？

吳 | 一個當然就是看到不同世代的人，然後是不同領域的人，有某種堅持，可以做十幾年。十幾年來雖然沒有在運動什麼，但是他還認同這個東西。然後又可以看到一些邀請的來賓、黨外人士，這些人實際上是有做政治工作的，然後會講很多你平常聽不到的東西。像我們在台灣出來，雖然參加黨外運動，但是很邊緣。他們就會講到現實上的話題，會後會進行比較深的辯論，通常會聊到凌晨半夜。

1987年的原住民之夜，我覺得影響蠻深的，對很多人都影響很深。看

22 編註：八〇年代北美洲發行了一份叫《台灣思潮》的刊物，其主要基地在洛杉磯(簡稱L.A.)，與刊物相關的一些人遂被叫作「LA派(拉派)」。《台社》就是以「LA派」為主導，在解嚴後的1988年聯合其他進步人士在台灣創刊的。這個《台灣思潮》的拉派可以溯源到七〇年代的一份北美洲台灣留學生的左翼刊物《台灣人民》，以及另一個重要源頭，即「保釣運動」。

到原住民的處境，還有各種對原住民的討論方法，這些在台灣不太可能接觸到。有一次，阿能(莫那能)、麻子(王智章)都在，我想那一場對我、對王蘋應該都是很有影響；還有統獨辯論那場，我覺得也是蠻重要的。就是老林故意邀蔡仁堅、蔡世淵辯論、進行政治討論那一場，那場原來還有賀端蕃。我跟王蘋也是在夏令營認識的蘇慶黎。夏令營對人際網絡的連結真的有用。甚至對「LA派」的形成，夏令營絕對也是有作用。我也是在夏令營認識了香港來的梁耀忠。要了解香港，在香港怎麼做基層，梁耀忠對我影響很大。他現在已經是立法委員了，但是他還在做基層服務。當時他是新生代，是所謂的托派，在香港做勞工服務起家的，然後才去參加選舉。我回台灣的時候，特別去看他的街坊工人服務處，這都是夏令營產生的效果。鄭村棋也是在夏令營認識的梁耀忠，我覺得這都有影響。這些平常在讀書會不一定能發生，或者不太可能發生這種效果。雖然是鬆散的連結，但是它也有組織性作用。而且像第二年，書店已經沒有在運作了，我們就進入籌備工作，比如聯絡，接送、買東西這些。那也是一個組織工作的過程。

「台灣社會研究」研討會

吳 | 那一年的暑假末，就是在籌備「台灣社會研究」研討會，我有參與到後半段的工作。我的印象中，第一，如果是1987年的夏令營，我是跟著老林。但是，如果是「台灣社會研究」研討會的話，就是跟著阿肥。1987年那屆林孝信比較是支援的角色。前面的幾屆我就不知道。是不是每年辦我也不知道。因為它也是像半附隨組織，就是夏令營邀來人，就同時被邀去參加研討會。因為研討會除了邀請學者發表對台灣看法或學術，也會邀請台灣學生去做報告。所以就像一魚兩吃，會併在一起。那年是柴松林等人都有參加……反正有好幾個議程，就是先到夏令營，然後到研討會。兩個面貌不一樣。我的理解是這樣：夏令營比較是運動型、聯誼型、組織型；但他們想要有一個學術的面貌去討論台灣的問題。

airiti
林 | 你說夏令營是聯誼型？

吳 | 對，而且是講中文。研討會是希望有一個以英語發表作為面貌的台灣研究研討會，學術面貌的，但是比較批判角度面對台灣社會的；然後，進一步可以跟國民黨的台灣論述競爭。我覺得基本上有這個目的，它的規畫也都是這樣。怎樣可以用支援會邀請來的人，以一個學術面貌繼續呈現，之後用英語發表到美國的刊物上，面對美國社群。至少我辦那一年定位很清楚，比較是這個性質。所以會把外國人，美國學生 involve (牽涉) 進來，儘量把這些人的東西都辦成英文。我 1987 年遇到工作核心人物，就是丘延亮，加上 Marshall Johnson (江士林)。阿肥後來把他邀到中研院幹活。

總之當時兩個主要的人，阿肥搞各種各樣的策略，Johnson 就把它弄成英文，再去找美國同學、教授，想辦法把各種資源組起來。但他儘量做成所謂的批判性的學術面貌。我在 1987 年看到是這樣。老林就是以支援會的名義去邀人來，作為一個支援型的團體。議程他不會去講太多意見，當然他會給一點想法，就是誰你應該去邀，讓他在國際論壇講話類似這樣。但是他比較是支援的角色。

林 | 你怎麼定義研討會跟夏令營、支援會的關係？

吳 | 第一個就是資源互相利用，但主支是民主支援會，因為它是透過募款把這些弄起來；研討會學校方面我不清楚，但是我覺得學校不會出資。比如說機票，學校最多補助研討會的場地，這些東西應該會有，可能有些出席費，但是機票方面應該是沒有。

總之研討會絕對不是附屬於夏令營，是兩個相對獨立的活動。研討會是借助整個芝加哥左翼社群可以影響的人，像阿肥、江士林是芝加哥大學「東亞研究圈」的成員。這個 circle (圈子) 是他們影響的，circle 成員都是博士生，也都是蠻厲害的研究生。當然是阿肥影響了江士林，但江士林跟老林關係也蠻好的。

airiti

林 | 可是我們從 1984 年那封信看起來，主席是林孝信？

吳 | 但是你說這個 circle 是他的附隨組織，我覺得……

林 | 不，我現在說的是「台灣社會研究」這個研討會，不管它辦了三屆、還是四屆。每次都在夏令營的時期同時辦，所以我現在要搞清楚這個研討會跟夏令營的關係，跟支援會的關係是什麼。

吳 | 我猜想 1984 年的話，應該是一個合作關係。就是說這些 circle 的學生，覺得支援會有資源，他們也覺得要做的這些內容也 OK，那就當作是支援會邀請，然後他們 circle 出人去協辦這個研討會，比較是這種性質。

林 | 合作的性質？

吳 | 對，比較是合作的性質。

陳 | 我們可以說「東亞研究圈」跟「台灣社會研究」研討會，一個是學術研討會的團體，他們辦的活動也就是這個研討會。所以這兩個是重疊的，可以這樣說嗎？

吳 | 可以，我覺得這樣說比較合適，我看過其他同學也都用英文討論這個會怎樣怎樣，然後阿肥跟江士林會建議大概邀請哪些人、會有什麼議題，大家覺得 OK，就會有這種報告。

陳 | 也就是說：這個「東亞研究圈」裡面，因為也包括了美國西方的學者、博士生，所以無論如何他們跟支援會是分開的。有個橋樑，其實就是阿肥跟江士林。

airiti

吳 | 分開的，對，我覺得比較是這樣。

林 | 那你怎麼看阿肥跟支援會的關係？他算是支援會的成員嗎？

吳 | 不算，他自己也不覺得算，老林也不覺得他是，但他就是盟友。江士林的位置也差不多。

林 | OK，那這樣就弄清楚了。1987年研討會的主題是什麼？

吳 | 我忘記了，反正就那些人。如果我參加過夏令營，然後再去參加研討會。印象中一定是夏令營更深刻，因為研討會有個學術包裝。但是我覺得研討會也是很清楚，對我來說是個很大的學習，就是如何透過學術，去做意識形態的論述戰爭。

我聽到阿肥跟江士林討論，說這個要怎麼弄，對美國人怎樣是有效的；打國民黨哪一點，怎樣用學術去包裝。對我來說，以前都不可能有這個認識。從我的生涯發展來看：學術作為戰鬥場域，我比較是在看這個東西。但是你說內容什麼，那些從台灣來的人、或者是其他人，一定在夏令營會講得比較有意思。它沒有框架，到學術裡，它就要裝得好像是學術報告的樣子，它的目的是跟國民黨論述去打。它是台灣民主運動支援會方面的活動。1987年也是這樣，這是夏令營，沒有研討會。這是夏令營裡面的研討，不是那個披著學術外衣的(研討會)，好像跟1987年解嚴有關。

李雅雯 | 學術方面的那一場，你有什麼印象？

吳 | 它是指夏令營本身的研討，不是指(台灣社會研究)研討會。舒詩偉沒有參加研討會，比較少啦。也是跟老林比較像，當後援角色，去當翻譯什麼的。

陳 | 我現在才知道：為什麼台大城鄉所會請江士林去教書，謝國雄有段時間

也去支援台大城鄉所。人際脈絡是這樣子連結的。我覺得比較訝異的是，事實上 Burawoy 是謝國雄的指導教授。支援會在這邊小心翼翼、謹慎地找《資本論》來念，那時候都還是很敏感的事情。但是謝國雄在 Burawoy 的課堂上對於這些事情的討論，根本就稀鬆平常了。

吳 | 但是你要回到那個時代，你跟誰念《資本論》是一個政治問題。台灣人找來念《資本論》，跟你在課堂上念《資本論》那是兩回事情。我們當然都知道他是跟 Burawoy，也知道他可能有念《資本論》。

陳 | 這有一點像是說我們剛在講「台灣社會研究研討會」，有一點類似那個意思。就是他在 Burawoy 的 seminar 上面念《資本論》，那叫作學術。但被你們找來念《資本論》，那叫作運動。

吳 | 對啊，沒錯。現在可能就分不清楚了，但是那時候就是這樣——因為他跟 Burawoy。所以我現在回想，他應該被我們列為是可以影響的人，只是後來他去搞學術了。

陳 | 那個時代出國念書，然後選擇去念勞動過程，找了一個這樣的老師，其實這些都有跡可循。

吳 | 當然，他念勞動研究，這是一個。他在「箴言社」裡面算積極，也參與了非常多的社團，剛剛說的那些東西他都有參與。food pool 的後段他參與了，信 pool 也有。然後研討會都有參與，但回來之後就漸行漸遠了。

吳永毅

簡歷

- 1974-1975 師大附中校刊《附中青年》編輯及主編
- 1977 淡江大學建築系系刊《像我們這樣的城市》編輯、淡江美術社社長
- 1978 《影響》雜誌美術編輯
- 1982 淡江大學建築系畢業
- 1982-1984 陸軍嘉義軍團工兵營工兵、團部通訊營文書兵
- 1984 內外設計工作室繪圖員兼工地主任
- 1985 美國芝加哥士林書店籌備、「台灣民主運動支援會」(OSDMT)夏令營義工
- 1986 美國洛杉磯《台灣思潮》讀書會成員
- 1986-1987 美國洛杉磯「箴言社」活動組成員、伙食合作團(food pool)成員
- 1988 《中國時報》要聞組勞工記者、《中國時報》產業工會發起人
- 1988-1989 新光紡織士林廠抗爭自救會顧問
- 1989-1991 《財訊月刊》記者
- 1992-2001 工人立法行動委員會核心幕僚
- 1991-1995 《島嶼邊緣》編輯委員
- 1996-1999、2012- 協助全國關廠工人連線抗爭
- 2004-2008 香港理工大學博士研究
- 2010-2011 世新大學兼任助理教授
- 2009-2014 台灣國際勞工協會(TIWA)移工個案社工
- 2014- 台南藝術大學音像紀錄與影像維護研究所專任助理教授
- 2019 因台南藝術大學校長違法解職音像學院院長發起抗爭